

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

石 鹏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现藏有两部明代缙绅录:一部是万历十二年(1584)春季缙绅录,该缙绅录为清阮元旧藏,本为其夫人孔氏奁中物,又先后归钱东璧、陈文田、徐乃昌等人所有;另一部是崇祯十四年(1641)秋季缙绅录,近人陈垣、郑振铎曾有收藏,丁传靖有抄本,后上海古籍书店又据丁氏抄本影印。国图所藏这两部缙绅录皆为明代北京坊肆所刊,所记官员包括京官与外官,传本罕见,具有较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关键词:国家图书馆 万历 崇祯 缙绅录

缙绅录^①,或称“缙绅册”,是明清时期记载全国范围内官员的职衔、姓名、字号、籍贯等履历信息的职官名录。至于缙绅录昉于何时,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引宋人洪迈《容斋三笔》中“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一语,案云:“此即今之缙绅录。”^②今人亦认为缙绅录滥觞于此^③。实际上,《班朝录》在宋人笔记中出现,并不意味着缙绅录此类文献的形成亦始于宋。缙绅录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这种形式至晚可追溯到唐。清人周广业已经注意到《资治通鉴》载有唐宣宗于大中二年(848)命宰相编纂《具员御览》之事,进而提出“缙绅有录,起于唐也”^④的说法。《具员御览》当以具员簿等人事档案为基

①或作“搢绅录”。

②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八“《班朝录》”条,中华书局,1991年,第151页。

③如张英宇认为,上述《容斋三笔》中关于《班朝录》的记载,“是缙绅录最早的正式记载”。闾红柳亦认为,“缙绅录的编纂,大约源于南宋之《班朝录》”。(张英宇:《清代搢绅录略考》,《文献》1984年第1期,第117页。闾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6页)

④周广业:《过夏杂录》卷五“缙绅录”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7页。

基础编纂而成的官员名录。此外,唐代的百官簿及班簿,均是以记载官员姓氏、职官为主要内容的名录,南宋《班朝录》或从唐代的班簿发展而来。故缙绅录的起源问题仍有探讨的余地。

现知最早的明代缙绅录为嘉靖缙绅录。道光十七年(1837),阮元为韩泰华所藏《顺治十八年缙绅册》题跋云:“余家藏嘉靖缙绅册,得自阙里孔氏。其京职一本题为‘搢绅’,至外省则不加以以缙绅之目。”^①又,阮元《擘经室二集》收录有《嘉靖搢绅册跋》:“余家藏嘉靖搢绅数册,得自阙里孔氏。其京职一册题曰‘搢绅’,至外省一册则但题曰‘仕宦便览’。”^②可知阮元所藏嘉靖缙绅册,本为山东曲阜孔氏之物。不过,有学者认为该嘉靖缙绅册“并非明嘉靖时物”^③,乃为阮氏所藏另一部缙绅录,即本文所要讨论的万历缙绅录。此说值得商榷。嘉庆八年(1803),阮元曾向其幕僚张鉴出示过万历缙绅录,张鉴跋曰:“《官册子》三卷,万历十二年春刊……今藏琅嬛仙馆,师举以示鉴,得记其后。”^④阮元在确知自己收藏有一部万历缙绅录的情况下,怎么会多次误记成嘉靖缙绅录?更为关键的是,据阮元记述,其所藏嘉靖缙绅录为两册,其中“外省一册”,题曰“仕宦便览”;今所见阮元旧藏万历缙绅录则为三册,记京外官者题曰“宦林备览”。二者在册数、名称上皆有差异,显然并非为同一部书。

嘉靖时期的缙绅录在当今还留存有实物^⑤,除此之外,已知存世的明代缙绅录尚有万历缙绅录四种^⑥、崇祯缙绅录一种。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代缙绅录两种,分别是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刊印的万历刻本《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以下简称“《缙绅便览》”,善本书号:02490)、《新刊南北

①《顺治十八年缙绅册》卷末阮元跋,国家图书馆藏本。

②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擘经室集》上《擘经室二集》卷八《嘉靖搢绅册跋》,中华书局,1993年,第580页。

③李振聚:《〈东江米巷湖广史氏新刊全号宦材备览〉考述——兼论明代搢绅录的体例与价值》,《图书馆杂志》2017年第9期,第116页。

④张鉴:《冬青馆乙集》卷七《书万历十二年春官册子后》,《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4-675页。

⑤如北京市文物局藏有嘉靖缙绅录的残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嘉靖缙绅录一册,但非原本,为民國二十一年(1932)吴廷燮抄本(《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三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08页。范邦瑾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⑥李振聚在《〈东江米巷湖广史氏新刊全号宦材备览〉考述——兼论明代搢绅录的体例与价值》一文中,所介绍的万历缙绅录有三种。此外,《中国古籍总目》还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万历缙绅册一卷”(《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三册,第1708页)。

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以下简称“《宦林备览》”,善本书号:02491),洪氏剗刷斋所刊崇祯刻本《新刊详注缙绅便览》(善本书号:15731),此皆由北京坊肆刊印,传本罕见,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一、明万历刻本《缙绅便览》与《宦林备览》

(一)版式与内容

《缙绅便览》一册,蓝印。无书名页,卷端题曰“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首叶九行,其他每半叶十行,每行字数不一。上下双边,蓝口,单鱼尾。前有缪荃孙、金蓉镜、曹元忠、周庆云、李详、鲍毓东作跋或题诗,卷末有刊记“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一行。钤有“扬州阮氏”“琅嬛仙馆”“文选楼”“积馀秘笈识者宝之”“南陵徐乃昌刊误鉴真记”“积学斋”“东壁图书”“陈文田硯乡氏藏本”“北京图书馆藏”诸印。

《宦林备览》两册,墨印。无书名页,卷端题曰“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其版式、行款与《缙绅便览》不同,首叶十五行,其他每半叶十六行,每行字数不等。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卷末镌有“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刊行”一行,书后附有阮亨《瀛舟笔谈》、张鉴《冬青馆集》中的相关内容,以及陶葆廉题跋、李宣龚题记等。钤有“阙里”“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东壁图书”“陈文田硯乡氏藏本”诸印。

在内容上,现存《缙绅便览》记京官,主要以官署为记载单位,包括内阁、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六部^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尚宝司、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太仆寺、鸿胪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宗人府、五军都督府、锦衣卫、驸马都尉、勋卫、五城兵马司以及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官员。《宦林备览》记外官,分省、府、州、县,包括十三省三司经历以下官员,以及府、州、县官。在官职之下,列有官员的姓名、字或号、籍贯,科举出身者还会标明中第年代,其余则注有官生、选贡、监生、儒士、恩贡、贡士等出身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藏书家曹元忠跋云:

顾顺天府尹、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经历、知事、照磨、检校以及大兴、宛平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则《缙绅》《宦林》两册悉同,岂以京尹、京县介于京官、外官之间,义取互见乎?若京官尚有南京诸官,外官亦尚有十三省布政、按察、各道参议、副使、僉事、太仆、苑马、都转等官,当

^①其中,吏部官员部分散佚一叶,仅见有“稽勋司郎中胡绪”“员外刘希孟”“主事□□”。

是别在一册,此适亡佚。^①

顺天府为畿辅重地,其衙署官员掌京畿地方事务,兼具京官与地方官的双重身份,因而互见于两册。至于南京诸官以及十三省布政使、按察使、各道参议、副使等官,曹氏认为“别在一册,此适亡佚”,此说有理。今《缙绅便览》版心位置均刻有“上”字,这说明现存部分为上册,《缙绅便览》原有下册。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所藏万历缙绅录《新刊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以及今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衬页之中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缙绅录,均载有南京各衙署官员以及十三省布政使、按察使、各道参议、副使等官^②。今《缙绅便览》不见该内容,可知下册部分已散佚。

又,鲍毓东跋云:

唯史称申时行字汝默,长洲人。《便览》称字瑶泉,吴县人。余有丁,史称字仲仲,《便览》称字同麓。许国,史称字维禎,《便览》称字颖阳。岂皆别一字耶?而申之异县,抑又何说?客笥无他籍印证,姑从盖阙。^③

鲍氏之所以有此困惑,是因为《缙绅便览》所记并非都是人物的字,亦有别号。如鲍氏所提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罪惟录》卷十三载:“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南直吴县人。”^④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西园闻见录》卷八载:余有丁“号同麓,鄞县人”^⑤。文渊阁大学士许国,《罪惟录》卷十三载:“许国,字维禎,号颖阳,南直歙县人。”^⑥此三人,《缙绅便览》所记皆为其别号,以致鲍氏误以为有别字。实际上,迨至万历,士人对别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如《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于人名之下,亦注出别号^⑦。至于申时行的籍贯,《明史·申时行传》载申氏为“长洲人”,《缙绅便览》则记为“吴县”。

①《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卷首曹元忠跋,国家图书馆藏本。

②《新刊大字全号缙绅便览》,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藏本。山东图书馆藏本情况参考李振聚:《〈东江米巷湖广史氏新刊全号宦材备览〉考述——兼论明代播绅录的体例与价值》,第116页。

③《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卷首鲍毓东跋,国家图书馆藏本。

④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三《申时行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77页。

⑤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200页。

⑥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三《许国传》,第2061页。按,关于许国的号,《缙绅便览》作“颖阳”,《罪惟录》则作“颖阳”,《本朝京省人物考》与《罪惟录》同(过庭训撰:《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三十七《许国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⑦李开升:《明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第11页。

南炳文先生据《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进士登科录》早已指出,吴县乃申时行的祖籍,而长洲为申氏的现居住地^①。故《缙绅便览》与《明史》对申时行籍贯的记载虽有异,但皆符合实情。

(二)成书时间

清张鉴《冬青馆乙集》与阮亨《瀛舟笔谈》均将《缙绅便览》《宦林备览》视为明万历十二年(1584)春季缙绅录。对此,曹元忠又有详细考证,跋云:

书后《笔谈》^②均定此书为万历十二年春季官册。校以《明史·七卿年表》,兵部尚书张学颜以十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而册止称兵部尚书者,十二年春季官册必在十一年冬印成,学颜于十二年二月所晋之阶,自不及载。惟万历九年裁革,至十一年复设之官,当以悉载无遗,故王廷瞻为户部总督仓场左侍郎,辛应乾为兵部协理京营戎政左侍郎,毛纲为提督军务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册皆与《职官志》密合。而又知其必非十一年冬季官册者,以册中癸未科庶吉士之称,非所施于本年,则其为十二年春季官册明矣。^③

包括曹元忠在内的清代学者皆认定此缙绅录为万历十二年春季官册,该问题看似再无讨论的必要,实则不然。通过上述曹氏的跋语,可以看出缙绅录有成书时间与刊印、发行时间之别。显然,万历十二年春季为该缙绅录的公开发行时间。那么,其成书于何时?曹氏以《明史》中《七卿年表》《职官志》覆核缙绅录的结果,只能说明此缙绅录成书于万历十二年二月之前,故有必要对缙绅录的记载时限作详细考察。

《缙绅便览》首页载有“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申时行”“武英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余有丁”“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许国”等。据《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一记载:万历十一年九月,“首辅申时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入监读书;余有丁加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餘官照旧,各给应得诰命。”^④此与《缙绅便览》首页所载官职合,是知《缙绅便览》的编纂在万历十一年九月之后。

①南炳文:《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历史教学》2008年第12期,第6-7页。

②按,“书后《笔谈》”是指《宦林备览》书后所附阮亨《瀛舟笔谈》中的相关内容。

③《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卷首曹元忠跋,国家图书馆藏本。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一,万历十一年九月乙未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29页。

考《明神宗实录》，曹元忠题跋中所提到的“辛应乾为兵部协理京营戎政左侍郎”在万历十一年十月^①，“王廷瞻为户部总督仓场左侍郎”“毛纲为提督军务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皆在同年十一月^②。这说明《缙绅便览》对万历十一年十月、十一月的官员升任状况有所反映。又《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记载：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癸丑（五日），“升太常寺卿李辅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③。丙辰（八日），又起用温纯为太常寺卿^④。核之《缙绅便览》，李辅的官职为“巡抚山东、提督军务、督理营田兼管河道、右副都御史”，温纯为“太常寺卿”，即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八日官员迁秩的人员名录尚见于《缙绅便览》。至迟到十二月下旬的迁转官员，《缙绅便览》不及载录。如《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载：万历十一年十二月辛未（二十三日），“起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姜宝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⑤。《缙绅便览》所载“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一职，其下人名空缺。再如，《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载：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戌（二十六日），“起原任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孙应鳌为刑部右侍郎”，“升应天府尹王元敬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⑥。而《缙绅便览》所载刑部右侍郎为舒化，《宦林备览》所载王元敬的官职仍为应天府尹。

上述可见，《缙绅便览》《宦林备览》反映了万历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上旬在职官员的情况，其成书时间应在该年十二月的中下旬。

（三）在后世的流存

该缙绅录为阮元旧藏，本为其夫人孔璐华奁中物。对此，阮元从弟阮亨所撰《瀛舟笔谈》卷七云：“明万历十二年春季缙绅，为吾嫂孔夫人阙里旧书。其签题‘大字缙绅便览’六字者，京官也；签题‘全号宦林备览’者，外官也。”^⑦《瀛舟笔谈》卷六又云：“予嫂孔夫人，字经楼，为至圣七十三代长孙女。”^⑧今缙绅录钤有阮元“扬州阮氏”“琅嬛仙馆”“文选楼”印及其夫人孔氏“阙里”“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印，亦可为证。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二，万历十一年十月庚戌条，第2639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万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条、甲辰条，第2670、2675页。

③《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癸丑条，第2680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丙辰条，第2682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条，第2690页。

⑥《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戌条，第2693页。

⑦阮亨：《瀛舟笔谈》卷七，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⑧阮亨：《瀛舟笔谈》卷六，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该书还钤有“东壁图书”印,此为钱东壁藏书印^①。钱东壁(1766-1818),字星伯,一字饮石,钱大昕长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诸生^②。其多藏书及金石拓片,曾为范氏天一阁编金石目录,范氏以《汉延熹华岳庙碑》拓本酬赠之。嘉庆十三年(1808),此碑帖又归阮元所有^③。据王章涛所编《阮元年谱》记载,钱东壁曾入阮元幕,“阮元与乃父有文字之契,复爱东壁,尤加器重。”^④该缙绅录或为钱东壁入阮元幕府后得之。

钱氏之后,该缙绅录又辗转归陈文田。陈文田(1813-1883),字砚乡,晚号晚晴老人,江苏泰州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二十三年(1843)顺天举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江西司郎中。暇日常游琉璃厂书肆,喜购书,藏书颇富^⑤。今缙绅录钤有“陈文田砚乡氏藏本”印。

光绪年间,徐乃昌得此缙绅录。徐乃昌(1869-1943),字积馀,号随庵,安徽南陵人,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与缪荃孙、叶昌炽、傅增湘等藏书家皆有交往。徐氏得缙绅录后,曾向钱塘鲍毓东索诗,今缙绅录有鲍氏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题诗。后缙绅录又被端方借去,久未归还,散出之后,徐氏“复以饼金六十展(辗)转购归”^⑥。徐乃昌所撰《积学斋藏书记》对缙绅录的行款、题跋等均有记载^⑦。徐氏之后,万历十二年春季缙绅录最终被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

二、明崇祯刻本《新刊详注缙绅便览》

(一)版式与内容

该书一册,墨印。无书名页,有署名为“泰衡居士”所撰序文。每半叶十三至十五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黑口,单黑鱼尾。卷端下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善本”“北京图书馆藏”印,卷末钤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等。扉页绘有身穿袍带服的天官,一手持笏板,一手指日;天官身旁有两个童子,一

①该藏书印还见于钱大昕手简(陈垣:《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文物》1963年第5期,第1页)。

②《[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③阮元撰,邓经元点校:《覃经室集》下《覃经室三集》卷三《汉延熹华岳庙碑整拓本轴子二跋》,第644页。

④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1157页。

⑤《民国续纂泰州志》卷二四《陈文田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46页。

⑥《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卷首李详题记,国家图书馆藏本。

⑦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涛整理:《积学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9-93页。

人持册,一人捧冠;天官身后有一鹿,盖以寓“禄”。图右一行题“正阳门里东城墙下”,左一行题“浙江台州洪家书铺”,上方横书云“指日高升为记”。明人程登吉《幼学琼林·文臣》载:“代天巡狩,赞称巡按;指日高升,预贺官僚。”^①“指日高升”乃官场预祝之词,故“指日高升”图既有不日内加官晋禄的寓意,同时又起到了牌记的作用。

该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北京各衙署官员,包括内阁、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尚宝司、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顺天府(包括大兴县、宛平县)、鸿胪寺、行人司、太医院、钦天监、上林苑、宗人府、五军都督府、锦衣卫、元勋世爵、驸马都尉、京营、总兵司、京卫等。第二,南京府部等衙门及北直隶、南直隶官员。第三,地方各衙门官员,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四川、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云贵各省的抚按镇守诸官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府州县各级衙门官员。

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八年缙绅册》卷末有阮元跋语,云:

嘉靖本于各省总督、巡按皆列于都察院衙门副宪之后,而外省则但自布政司始。此册于都察院既列各省总督、巡按矣,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曷曷乎不列于京职。故册首叶题曰“新刊随省总督抚按总镇缙绅”,曰“新刊随省”者,明乎旧之不随省也。^②

实际上,各省总督、巡按既列于都察院,又列于各外省,这种记载形式早在《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便已如此。对此,《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题“正阳门里东城墙下浙江洪家随省抚按高头缙绅”“新刊详注分省抚按缙绅便览”,皆强调“随省(或分省)抚按”这一特点。《顺治十八年缙绅册》亦为洪氏剗刷斋刊印,故“随省抚按”或为明末清初洪家所刊缙绅录的一大特色。

(二)成书时间

国家图书馆所藏《新刊详注缙绅便览》的版本标注为“明崇祯洪氏剗刷斋”,至于其具体的成书时间则不详。该书卷首载有“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张四知”“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户部尚书魏炤乘”“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演”等阁臣。据《国榷》记载:崇祯十四年二月,“进范复粹少保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四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魏炤乘太子少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演礼部尚书、文

①程登吉著,邹圣脉增补,胡遐之点校:《幼学琼林》卷一《文臣》,岳麓书社,2002年,第31页。

②《顺治十八年缙绅便览》卷末阮元跋,国家图书馆藏本。

渊阁大学士,各赐金带”^①。其中,建极殿大学士范复粹不见载于缙绅录。考《国榷》,范氏于崇祯十四年五月致仕^②,故该缙绅录的编纂当在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之后。据《国榷》记载:崇祯十四年六月,“沈惟炳为左通政”“刘广生为南京刑部尚书,史可法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凤泗,惠世扬为刑部左侍郎,徐燿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③。同年七月,“吴太冲为南京国子司业”^④。缙绅录对此皆有反映。八月,“许定国为署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山西”“崔源之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⑤。而缙绅录所记“镇守山西”者为冯举,“巡抚延绥”者为刘令誉,是知缙绅录对八月的官员迁秩情况未及载录。故《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成书时间在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左右,反映了该年五月、六月、七月官员的在职情况。考虑到印行时间,此应为崇祯十四年秋季缙绅录。

(三)与其他诸本的关系及其流传始末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的抄本缙绅录,题签曰“分省抚按缙绅便览”。遗憾的是,该本既无影印说明,又无出版年月,不知所据何本。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据该书所钤“崇儒堂”“丁传靖印”“闇公”“京江丁氏珍藏”诸印,指出原本应为丁传靖旧藏抄本^⑥。丁传靖(1870-1930)^⑦,字秀甫,号闇公,江苏丹徒人,光绪丁酉(1897年)副贡。工诗文,擅词曲,著有《闇公诗存》《闇公文存》《宋人轶事汇编》《明事杂咏》等。吴廷燮为《明嘉靖乙丑搢绅》作跋云:“丁闇公先生有《明崇祯十五年搢绅》,惜未之见。”^⑧又,丁氏之友伦明云:“丹徒丁闇公传靖,治乙部书,尤好宋明稗官野史,搜访甚备,多秘本。余每从借录,尝借得丰润张氏《明季清初二十八科进士履历》,又借余《崇祯十五年缙绅录》,皆手钞之。”^⑨吴、伦二人所说的丁传靖藏《崇祯十五

①谈迁:《国榷》卷九七,中华书局,1958年,第5888页。

②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96页。

③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98页。

④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0页。

⑤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1页。

⑥伍跃:《明末州县官僚的地理分布——〈以分省抚按缙绅便览〉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2014年,第100页。

⑦据陈宝琛所撰《丁君闇公墓志铭》,丁氏生于同治庚午(1870)四月,卒于下一个庚午(1930)九月(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2页)。

⑧《明嘉靖乙丑搢绅》卷末吴廷燮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⑨伦明著,东莞图书馆编:《伦明全集》第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年缙绅录》抄本,实为崇祯十四年秋季缙绅录^①,此即为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分省抚按缙绅便览》的底本。

问题是,丁氏旧藏抄本缙绅录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崇祯刻本《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经过比对,丁氏抄本的内容与《新刊详注缙绅便览》相同,就连缺字的部分都完全一致,如《新刊详注缙绅便览》卷末“(平越)同知董邦昌”“雍安知县曹期昌”的字号及籍贯皆有残缺,而丁氏抄本亦如此。这说明崇祯刻本《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为丁氏抄本的底本,后上海古籍书店又将丁氏抄本影印出版。

关于《新刊详注缙绅便览》在后世的流传,由于该书在明清公私藏书志中未见著录,前期的流传情况尚不明。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记载,新会陈氏(陈垣)曾藏有此书^②。又郑振铎在《西谛题跋》记《乾隆缙绅全书》云:“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祯缙绅录》,则当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③该跋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知郑先生于1954年在杭州购得此书,但不知与陈垣所藏是否为同一部。郑先生得此书后甚为欢喜,曾致函赵万里云:“论述明季史料者,当见之狂喜!”^④1958年郑先生因意外去世,家属将其全部藏书捐献给政府,负责接收这一批藏书的正是当时的北京图书馆^⑤。“郑先生生前曾拟自编藏书目录,没有实现。当其家属捐献全部图书给北京图书馆时,随着有一份按排架顺序编列的草目”^⑥。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的王树伟、朱家濂等先生对原编草目重新校正,合力编成了《西谛书目》。该书目“职官录”收录有“《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不分卷”,注云“明崇祯洪氏剞劂斋刊本一册”^⑦。故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乃郑先生离世后,由其家属所捐献。

三、缙绅录的史料与文献价值述略

缙绅录作为官场指南,按季印行,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新的缙绅录一旦刊印,旧册便失去使用价值。清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云:“《缙绅录》

①李振聚:《〈东江米巷湖广史氏新刊全号宦材备览〉考述——兼论明代缙绅录的体制与价值》,第118页。

②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③郑振铎:《西谛题跋》,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2a页。

④虞坤林:《郑振铎致赵万里遗札一封半》,《出版史料》2004年第4期,第34页。

⑤朱家濂、王树伟:《“西谛藏书”概述》,《图书馆》1961年第3期,第10页。

⑥朱家濂:《介绍最近即将出版的〈西谛书目〉》,《图书馆》1963年第3期,第9页。

⑦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卷一,第28b页。

一书在刊行时,第为翻检当代中外官员人名而设,一经更调,便如明日黄花矣。”^①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亦云:“是书(注:指万历十二年春季缙绅录)在当时断无人珍惜,而数百年后转成希世珍,亦奇遇也。”^②正因缙绅录在当时不被珍惜,明代至清前期的缙绅录在后世已不多见。清顺治时期的缙绅录在乾隆之时即被视为珍本,如《顺治十八年缙绅册》为纪昀所收藏,后又有法式善、阮元、邵懿辰等名家为之作跋^③。清代早期缙绅录之稀见尚如此,遑论明代。国家图书馆所藏万历、崇祯缙绅录,是为数不多的流传至今的明代缙绅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略述如下:

第一,缙绅录可补纠史书对官职、人名记载之缺讹。在明代官场中,一人身兼数职,是常有之事,但史书往往难以将其所任之职悉数记载下来。如《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载: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升大理寺左少卿李己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④核检万历《缙绅便览》,所记李己官职除右佥都御史及巡抚保定外,尚有“提督紫荆关”“兼管河道”,比实录记载更为全面。此例甚多,兹不赘举。再如,谈迁《国榷》是记载有明一代史事的重要编年体史书。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国榷》为张宗祥先生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校补而成^⑤,因版本问题,文中仍有不少缺字。如《国榷》卷九十七载:崇祯十四年六月,“卫胤文、吴伟业为左右□□”^⑥。《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记卫胤文、吴伟业的官职为左春坊左中允,“中允”是为《国榷》所缺二字。值得注意的是,对吴伟业官职的记载,二书略有出入。吴伟业虽官秩不高,但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上颇有影响力,故自清道光以来,有不少学者为其编纂年谱。其中,以冯其庸、叶君远所编《吴梅村年谱》最为详赡。据该年谱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吴伟业被任为左中允^⑦。判断为“左中允”的依据为:《国榷》载有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吴伟业以左中允升任左谕德兼侍讲^⑧。结合《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记,基本可以坐实这一说法,即崇祯十四年吴伟业的实授官职当为左中允,非右中允。

①朱彭寿撰,何双生点校:《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页。

②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涛整理:《积学斋藏书记》,第89页。

③《顺治十八年缙绅册》,国家图书馆藏本。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万历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条,第2674页。

⑤吴晗:《谈迁和〈国榷〉》,谈迁:《国榷》卷首,第2页。

⑥谈迁:《国榷》卷九十七,第5899页。

⑦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⑧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第98页。

缙绅录为时人所编,对任官者姓名记载往往比较准确、可靠,这对纠正明代文献中人名记载有歧异者,亦有帮助。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二载:万历十一年十月,“改南京光禄寺卿沈人种为光禄寺卿”^①。黄彰建《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卷四十六云:“沈人种,抱本‘种’误‘种’。”^②《明穆宗实录校勘记》卷二十五亦云:“沈人种,抱本‘种’作‘种’,误。”^③是知《明实录》因版本不同,有“沈人种”“沈人种”两种记载。查万历《缙绅便览》,所载光禄寺卿作“沈人种”,与抱本(即嘉业堂所藏抱经楼本实录)同,可备一说。

第二,缙绅录可查考一时之职官、员额设置与废革状况。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且两京均设有完整的中央机构。南京既为留都,衙署事务相对清简,其职官与员额裁减不一,利用缙绅录,可通览明代南京各机构一时之职官与人员设置状况。据万历《明会典》卷三《官制二·南京官》载,南京六部设尚书、右侍郎各一员;南京吏部与礼部四司郎中均为四员,主事两员,司务一员;南京户部十三司郎中十三员,员外郎五员,主事十七员,司务一员,照磨一员;南京兵部四司郎中四员,员外郎两员,主事五员,司务一员;南京刑部十三司郎中十三员,员外郎一员,主事十员,司务一员,照磨一员,司狱二员;南京工部四司郎中四员、员外郎一员、主事八员,司务一员^④。据《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列人员,至崇祯十四年,南京六部职官及员额设置已有较大变化,南京吏部不设右侍郎及主事;南京户部十三司不设员外郎,郎中则缺员三人,主事缺员五人,其中,江西司主事增为三员,缺员一人;云南司主事减为一员^⑤;南京礼部不设右侍郎及郎中,由主事管郎中事,祠祭司主事及司务缺员;南京兵部不设员外郎,武选司不设主事,右侍郎缺员,车驾司、武库司主事各缺员一人;南京刑部不设右侍郎、员外郎、照磨,山西司、四川司、广西司、贵州司不设郎中,以主事管郎中事,十三司中其他诸司有郎中,则不设主事,十三司郎中及主事共计缺员三人;南京工部不设员外郎,尚书缺员,营缮司主事增为三人,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主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二,万历十一年十月癸丑条,第2641页。

②黄彰建:《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327页。

③黄彰建:《明穆宗实录校勘记》,第225页。

④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三《官制二·南京官》,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

⑤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南京户部江西及云南司主事各二员(《〔万历〕明会典》卷三《官制二·南京官》,第14页)。

事均减为一员^①。总体来看,与万历《明会典》记载相比,崇祯十四年南京六部基本不设右侍郎及员外郎,郎中、主事存在缺员,且南京礼部与刑部均存在以主事管郎中事。

值得注意的是,《新刊详注缙绅便览》还开列有监督或督理银库、粮厅、钞关等事务的南京户部官员姓名,此不见于万历缙绅录^②,如钦差监督银库及管查粮厅王若之、监税分司程震、督铸共济厂何九说、管旧钱厂及新钱厂周世庆、监督江北四府仓驻浦口杨春育、监理淮安钞关驻札板闸李可植、监督扬州钞关驻本府李呈芬、督理北新关商税驻杭州府陈治纪,这些监督官本职均为南京户部郎中或主事。还有部分兼职,暂为空缺,如督理清忠厂鼓铸、专管新饷、监督盐政分司等。其中,清忠厂为鼓铸铜钱的炉厂,吕维祺于崇祯六年(1633)提出开设,并得以奉旨允行,该厂属南京户部所管^③。以上说明随着明末财政危机的加深,崇祯帝不仅在南京开设新的铸钱炉厂,还加强了对南京银库及粮厅、钱厂、钞关、仓粮的监管,凡此皆可从《新刊详注缙绅便览》的职官记载中窥见一斑。

缙绅录对明代地方官的集中记载,亦颇有价值。明代府、州、县的佐贰官,添革不一,加之文献记载较少,对于当时全国的状况,殊难掌握。故缙绅录所记府、州、县官吏,对查考明代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吏的设置情况大有裨益。

第三,缙绅录在明代官员群体的定量分析上具有独特优势。明代缙绅录只载人物姓名、字号、籍贯、出身资格等基本信息,对史学研究而言,其所提供的信息面似乎很狭窄。其实不然。缙绅录的优势在于其记载人物数量多,范围广,由此可对官员群体作量化分析,生成更具史学价值的二次信息。因清代缙绅录保留下来的较多,且记载连续性强,2014年以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李中清、康文林团队将清代缙绅录所载信息录入数据库,创建了《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并与题名录、朱卷、乡试录、同年齿录、捐纳名录等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匹配连接”^④。目前该数据库已更名

①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南京工部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四司主事均为二员(《〔万历〕明会典》卷三《官制二·南京官》,第15页)。

②按,因国家图书馆所藏《缙绅便览》关于南京官员部分已佚,其记载情况不详。不过,日本筑波大学藏本万历《新刊大字全号缙绅便览》所载南京户部官员名录中,未有监督银库此类官员。

③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四《增清忠厂疏》,清康熙二年(1663)刻本。

④任玉雪、陈必佳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61页。

为《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面向学界逐步公开,嘉惠学林。尽管明代缙绅录存世者少,尚无法建立大规模量化数据库,但通过文本分析,仍可对明代某一时期的文官群体作宏观和量化研究。比如,《明史》卷七一《选举三》载:“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①利用缙绅录,可进一步分析明代中央及地方官员的出身资格情况。以崇祯十四年《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载北京六部官员为例,其出身资格状况详见下表1:

表1 崇祯十四年北京六部官员出身资格表

	进士	庚辰特用	官生	举人	选贡	其他	总计
吏部	12	1	0	1	0	0	14
户部	55	12	20	3	0	1	91
礼部	22	1	0	0	0	0	23
兵部	29	2	0	1	1	0	33
刑部	28	10	7	0	0	0	45
工部	29	4	7	2	1	0	43
总计	175	30	34	7	2	1	249

关于此表,须说明的是,“庚辰特用”是指崇祯十三年夏,崇祯帝破格用人,“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②。换言之,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举人和贡生,只是取得了进士待遇般的初授官资格。由此表可见,明末北京六部官员主要是从进士、举贡和官生中选授,其他出身者甚少。其中,进士是北京六部官员的最大来源,有175人,约占总人数的70.28%;其次则是官生,有34人,约占13.65%。“庚辰特用”30人中虽有一部分是贡生,加上选贡2人,其总数仍不会超过官生,这说明在明末各类国子监生中,入仕北京六部者,主要集中在品官子弟。从《新刊详注缙绅便览》记载来看,官生群体在六部衙门中,多任中下级官职,所任最高官职为郎中(正五品),这也说明当时六部衙门中的官生,很难进入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的行列。

除了出身资格外,缙绅录所载官员的籍贯信息,同样可以通过定量分

^①《明史》卷七一《选举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715页。

^②《明史》卷二七四《雷縯祚传》,第7032页。

析,来考察明代官员的地理分布及相关的人事制度^①。总之,缙绅录可为明代官员群体的定量分析提供丰富的数据或样本。

第四,缙绅录还是研究明代北京书坊及其刻书的重要文献。对于明代北京坊肆,各类史籍记载寥寥,其概况(如书坊名称、方位、所刊书目等)多数是通过坊肆所刊印并流传下来的书籍获知,故万历与崇祯缙绅录是了解明代北京叶铺和洪铺两家书坊的重要的文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明代北京书坊有过系统考察,认为可考者有十三家,其中包括铁匠胡同叶铺、洪氏剞劂斋两家,谓“这两家开清代琉璃厂书铺刊《缙绅录》之先河”^②。其所利用的资料正是这两家刊印的缙绅录。实际上,明代北京书坊可考者不止十三家。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所藏万历缙绅录《新刊大字全号缙绅便览》《新刊全号宣林备览》为“正阳门里东城墙下湖广史氏刊行”^③。由于该缙绅录藏于国外,以前国内学者知之者甚少,故湖广史氏书铺多被以往学者所遗漏。这也提醒我们,明代北京书坊或还有湮没于文献者,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考证。

关于明代北京书坊的主要聚集地,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魏隐儒先生认为明代北京书坊大多集中在正阳门一带,“到万历年间,书肆铺坊可能有些移动。虽无志乘可考,但从书上所附牌记,可略知当时概况”^④。其利用的牌记正是《缙绅便览》卷末所镌“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王钟翰先生则认为明代北京刻书之地主要集中“在宣武门内之铁匠营与西河沿两处”^⑤。从现存缙绅录来看,万历、崇祯年间,正阳门里东城墙下一带尚有湖广史氏、洪氏剞劂斋两家出版缙绅录的书坊。另外,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⑥所谓“大明门之右”,即在正阳门里,是知在明中后期正阳门里一带仍是北京书肆铺坊的主要聚集地。至于宣武门里铁匠胡同,李贽的《焚

①伍跃:《明末州县官僚的地理分布——以〈分省抚按缙绅便览〉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2004年,第97-113页。

②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按,“洪氏剞劂斋”,张先生作“洪氏剞劂斋”,据《新刊详注缙绅便览》卷首泰衡居士序文末落款,当为洪氏剞劂斋。

③《新刊全号宣林备览》卷末牌记,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藏本。

④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⑤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卷四《北京书肆记》,中华书局,1954年,第380页。

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书》曾提到“铁匠胡同梓人”^①；从《缙绅便览》中可知有书坊叶铺，这说明万历年间铁匠胡同亦是北京比较重要的刻书之地。明清易代后，北京书肆坊铺的迁移轨迹比较明显，主要由内城迁往外城。如崇祯时期的洪氏剗刷斋到清顺治年间，已经从正阳门里东城墙下迁至正阳门外西河沿^②；清中叶以降，宣武门外琉璃厂又渐成北京书坊刻书及鬻书的闹市^③。故王钟翰先生所说的西河沿当为清初北京书坊的集中地，明代则主要集中于正阳门里及宣武门内铁匠胡同一带。

利用缙绅录，并借助于其他文献，还可对北京个别书坊作更为全面的考察。如清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云：“自明以来，缙绅、齿录俱刻于京师西河沿洪家老铺，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册会试齿录，犹是洪氏汇集所印。”^④今宁波天一阁尚藏有洪家书铺所刊康熙十五年（1676）、十八年（1679）、二十四年（1685）及三十三年（1694）《进士履历便览》^⑤。由此可知，洪家书铺是明末清初专门刊印缙绅录、齿录、进士履历便览的北京书坊。

四、余论

清代缙绅录已有文武之别，文职官录多称作《缙绅全书》或《爵秩全览》，武职官录一般称作《中枢备览》^⑥。武职官录除了有单行本外，书坊还常将其与文职官录合刊。如有学者认为：“《爵秩全览》后附《中枢备览》，最早见于雍正五年秋季，这种文武合刊形式，在坊刻中最为多见，乾嘉以后日渐盛行。”^⑦据《清代缙绅录集成》所收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缙绅录，雍正四年（1726）夏季官册《爵秩新书》即已附《中枢备览》^⑧。现存明代缙绅册中，尚未见有专门的武职官录。据《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所镌“指日高升洪家随省

①李贽著，陈仁仁校释：《焚书》卷三《卓吾论略》，岳麓书院，2011年，第147页。

②马子木：《国家图书馆藏顺康缙绅册》，《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129页。

③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4页。

④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⑤袁慧：《天一阁藏明清〈进士履历便览〉述略》，天一阁博物馆编：《科学与科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⑥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播绅录的刊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2分，2016年6月，第346页。

⑦刘蔷：《荣禄堂与清代播绅录之出版》，《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10期，第64页。

⑧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

总监抚按总镇缙绅履历戎政儒林便览”，其中，“戎政”即与军事政务有关^①，可知《戎政便览》当为武职官录。

另外，清代缙绅录有官刻与私刻之别。官刻缙绅录由吏部负责，编纂之前，行文各衙门，要求提供资料；编成之后，按季刊印，进呈御览^②。而现存的明刻本缙绅录皆是坊刻本，是否有官刻本，尚不得知。除了对明代缙绅录进行文本研究外，结合相关史料，考察明代缙绅录编纂、刊印、流传等基本状况，亦是明代缙绅录研究的题中之义。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朱绍祖、张登璨对本文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石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如明代设有“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掌京营操练之事”；再如“嘉靖二十年（1541）始命尚书刘天和辍部务，另给关防，专理戎政”（《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第1754页）。

②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第349-356页。